

索马里的伊斯兰化与阿拉伯认同的历史起源^{*}

闫 伟

摘 要: 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的传播伴随着“阿拉伯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索马里的民族认同。公元7世纪末,伊斯兰教通过阿拉伯移民传入索马里。在南部沿岸的摩加迪沙形成了阿拉伯化的城市国家,伊斯兰教借此向索马里内陆传播。相较而言,北部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缓慢,主要依靠当地传说的一些阿拉伯圣徒传教,形成了位于亚丁湾沿岸的泽拉和柏培拉等索马里北部的宗教中心。公元14世纪,索马里沿岸城市基本完成了伊斯兰化,大量索马里本土成长起来的穆斯林学者成为传教的主力,并伴随着索马里苏非派的扩张向内陆部落民传播。这使苏非派和部落力量在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中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一些索马里人开始重新“发明”和“建构”自身的部落起源和谱系。他们将早期阿拉伯移民、苏非派的先祖或圣裔塑造成为近代以来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历史起源。就这样,阿拉伯起源说成为与非洲起源说相并立的认同观念,这对于索马里近代以来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 伊斯兰教; 索马里; 阿拉伯认同; 苏非派; 部落

作者简介: 闫伟,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西安 710127)。

文章编号: 1673-5161(2020)06-0107-17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阿拉伯国家政治继承问题研究”(18ASS005)的阶段性成果。

索马里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隔红海相望,是热带非洲少有的完全伊斯兰化的国家。当代绝大多数索马里人信仰逊尼派教义,尊奉哈乃斐学派教法。一般认为,索马里人是东非的本土民族,属于库希特人的一支,至少在公元前 10 世纪已在东非繁衍生息。但是,索马里社会却存在一种独特的政治观念,即认为索马里人和索马里文明起源于阿拉伯半岛。1974 年,索马里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除却现实的经济与政治考量之外,根深蒂固的阿拉伯认同无疑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观念与近代西方学界对于索马里人的认知不谋而合,在索马里广为传播,影响甚大。19 世纪以来,受到殖民主义史学的影响,一些索马里人重新“发现”和利用起阿拉伯起源说,他们将本地的历史追溯到阿拉伯移民的到来,^①并将索马里人的祖先追溯到圣裔家族,^②甚至强调索马里的阿拉伯起源和亚洲起源,反对非洲起源说。与阿拉伯起源说相对应,索马里部分精英强调索马里的非洲属性和本土认同,反对阿拉伯起源说。阿拉伯认同与本土化的索马里认同^③的矛盾成为影响当代索马里民族建构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

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产生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密切相关。事实上,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商人已活跃于索马里沿海地区,但当时并未出现所谓的阿拉伯认同。伴随着宗教的传播,大量阿拉伯人迁往索马里,在东部沿海城市扎根,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市国家。同时,这些阿拉伯人向内陆索马里部落地区的传教活动深刻影响了部落社会的认同观念,许多部落将谱系的血统和伊斯兰教的道统合而为一。索马里的阿拉伯认同正是植根于此。可以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播成为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历史源头。这一过程无疑伴随着索马里的伊斯兰化,与北非的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存在明显的区别。^④

西方学界主要关注历史上索马里的阿拉伯移民、当代索马里政治伊斯兰和

① [摩洛哥]M. 埃尔·法西主编《非洲通史(第三卷)》,屠尔康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547 页。

② 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08, p. 2.

③ 近代以来,非洲之角兴起了以整个索马里族作为认同对象,试图建立统一索马里国家的思潮,即索马里主义(Somalism),本质上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

④ 在北非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认同的产生与阿拉伯人大规模的迁徙和征服,以及由此引发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等本土民族的融合有关。但索马里人历史上并未经历阿拉伯人的征服过程。

苏非派教义等,^①国内学界对于索马里的研究更多侧重当代索马里问题尤其是海盜问题、政治伊斯兰等,^②而对于索马里的阿拉伯认同观念缺乏深入研究。

索马里在古代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不同地区处于分立状态。从文化上看大致分为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贝纳迪尔海岸)和内陆地区。尽管三者的伊斯兰化都与阿拉伯移民密切相关,但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宗教传播上呈现三种类型。本文分别阐释这三地阿拉伯移民与伊斯兰化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剖析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历史根源及其当代回响,为重新认识当代索马里人的认同观念提供历史借鉴。

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索马里南部沿海的播散

前伊斯兰时代,非洲之角就与阿拉伯半岛存在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两者围绕红海和印度洋形成了紧密的贸易圈。在希腊罗马时代,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贸易,一些阿拉伯人尤其是也门人已在索马里沿岸城市经商,并与索马里人通婚。公元570年的“象年战争”之后,阿比西尼亚人撤离阿拉伯半岛,一些也门人追随阿比西尼亚人到达非洲之角,定居摩加迪沙。但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化对索马里的影响并不大:基督教文化、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在索马里沿海地区十分盛行;而在内陆地区,仍然以万物有灵和偶像崇拜为主。

伊斯兰教诞生后,索马里沿海地区首先受到影响。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移民的到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开始在索马里扎根。阿拉伯移民推动了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的早期传播。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一些圣门弟子为躲避麦加贵族

① 参见 Ali Jimale Ahmed, ed., *The Invention of Somalia*, Lawrenceville: The Red Sea Press, 1995, pp. 1-265; Ali Abdilahir Hersi, *The Arab Factor of Somalia Histor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pp. 1-334; I. M. Lewis, "Sufism in Somaliland: A Study in Tribal Islam I,"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7, No. 3, 1955, pp. 581-602; Markus V. Hoehne, Virginia Luling, eds., *Peace and Milk, Drought and War: Somali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I. M. Lewis*, London: Hurst and Co. Publishers, 2010, pp. 1-437.

② 张湘东《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索马里族问题》,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第48-53页;李文俊、谢立忱《索马里民族国家重构的困境与出路》,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45-50页;李福泉《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演进与特点》,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第71-76页;徐亚莉《族际冲突与国家失败:以索马里为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6期,第86-100页;王涛、赵跃晨《泛索马里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兼论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第40-52页。

的迫害,迁往阿比西尼亚。615 年,他们到达索马里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泽拉(Zeila),^①并在该地建造了双朝向清真寺(Masjid al-Qiblatayn),^②其中一些穆斯林留在了泽拉,当地的迪尔部落(Dir)受此影响皈依伊斯兰教。一些索马里人由此认为,他们的先祖在 622 年先知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之前就已皈依了伊斯兰教。^③

但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最先在索马里的南部沿海地区扎根。伊斯兰教诞生后,大批阿拉伯人以及部分波斯人移民索马里。其中,既有对哈里发或逊尼派统治者不满的宗教和政治反对派,也有来索马里寻找商机的阿拉伯人,还有一些阿拉伯人迫于阿拉伯半岛严酷的生存压力而迁往索马里。7 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南部沿海地区,即贝纳迪尔海岸(Benadir)^④。695 年,伊拉克的阿拉伯乌玛尼部落(Umani)拒绝向倭马亚王朝效忠和缴纳天课,并支持在麦加自立的哈里发扎拜尔(‘Abdullahi ibn Zabair),因此遭到镇压。该部落被迫迁往索马里南部沿海地区避难。这也是阿拉伯人第一次较大规模地移民索马里。^⑤

事实上,在乌玛尼部落到来之前,索马里南岸已有一些阿拉伯穆斯林聚居区,但伊斯兰教的传播十分缓慢。乌玛尼部落成为索马里阿拉伯—伊斯兰化的支点,伊斯兰教迅速在索马里南部地区传播。此后,阿拉伯人 8 次移民索马里。^⑥但是,贝纳迪尔海岸的索马里人更多是形式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的宗教和习俗混杂着大量本土的传统信仰。12 世纪中期,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Al-Idrisi)指出,在摩加迪沙以南的布拉瓦(Brava),当地居民没有任何信仰,他们将地面突起的石柱视为神灵,为之涂上鱼油,并且崇拜之。这些部落不食用鱼、贝类、青蛙和蛇等,在一定程度上应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⑦如今,索马里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古代阿拉伯人的墓葬,碑刻显示当时该地区有许多穆斯林。

这些穆斯林构成十分复杂,阿拉伯人是主体,也有一定数量的波斯人。例如,南部港口城市摩加迪沙有一个街区名为“辛佳尼”(Shingani)就是古代波斯内沙布尔的别称,当地的珊辛亚部落(Shanshiya)最早为波斯部落。^⑧贝纳迪尔在波

① Raphael Chijioke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2013, p. xxii.

② 该清真寺意为双朝拜方向,即在清真寺内部存在两个朝拜用的神龛,分别朝向麦加和耶路撒冷。

③ Ali Jimale Ahmed, ed., *The Invention of Somalia*, p. 1.

④ 阿拉伯人最初将之称为僧祇海岸(Zanj),即“黑人的土地”之意。

⑤ Ali Jimale Ahmed, ed., *The Invention of Somalia*, p. 5.

⑥ Maria Brons, *Society,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State in Somalia: From Statelessness to Statelessness?*, Utrecht: International Books, 2001, p. 98.

⑦ Ali Abdilahim Hersi, *The Arab Factor of Somalia History*, p. 118.

⑧ Michael Dumper and Bruce E. Stanley, eds., *C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7, p. 253.

斯语中意为“城市”或“中心”。从宗教上看,除逊尼派外,还存在什叶派尤其是宰德派。739~740年,也门的一些宰德派到达贝纳迪尔海岸,并且统治这一地区长达200年。乌玛尼部落受此影响被迫向索马里南部内陆迁徙,到达了谢贝利河谷。如今,当地的吉勒迪部落(Geledi)就声称来自乌玛尼部落。

尽管当今索马里的阿拉伯移民以逊尼派为主,但也融合了包括宰德派在内的什叶派信仰元素。索马里人与其他逊尼派不同,将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和法蒂玛的后代称为“阿什拉夫”(Asharaf),将之视为圣人。^①在索马里人看来,阿什拉夫具有神性和宗教权威。此外,索马里妇女每周还举行纪念法蒂玛的宗教活动,甚至还纪念历史上的“女圣徒”。这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索马里人将社会和政治领袖冠之以具有什叶派色彩的“伊玛目”称号。

摩加迪沙是索马里南部的传教中心和经济中心。倭马亚王朝时期,摩加迪沙已形成了城市国家,其居民主要为阿拉伯移民,但事实上仍独立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统治之外。^②13世纪初,阿拉伯人哈马维指出,索马里人是黑人,他们与亚洲人肤色不同,摩加迪沙主要是亚洲人而非黑人。^③由此可见,摩加迪沙直到13世纪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阿拉伯人的商业据点。^④摩加迪沙在很大程度上联通了索马里的谢贝利河与朱巴河流域,^⑤并成为南部内陆和沿岸地区的贸易中心。

伴随着贸易往来,摩加迪沙成为南部地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播的枢纽。阿拉伯移民在索马里南部沿海地区的传教和经商活动成为索马里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肇始。但是,索马里的穆斯林以外来移民尤其是阿拉伯移民为主,索马里本土居民仍游离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外。当代索马里的阿拉伯人仍主要分布于南部沿海地区。^⑥

二、伊斯兰教在索马里北部沿海传播的历史图景

索马里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伊斯兰化上既存在共性,同时也具有不同的

① Mohamed Haji Mukhtar,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Lanham, Maryland, and Oxfor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3, p.11.

② Andrew Rippin, ed., *The Islamic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40.

③ Ali Jimale Ahmed, ed., *The Invention of Somalia*, p. 6.

④ I. M. Lewis, "Sufism in Somaliland: A Study in Tribal Islam I," p. 589.

⑤ 谢贝利河与朱巴河分布于索马里南部,也是索马里主要的两条河流。河流沿岸存在许多市镇和农业区域,并且具有一定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当地人能够生产一些布匹、石磨,以及粮食和皮革等。这些商品不仅用于本地,而且还出口到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⑥ Saadia Touval, Saadia Weltmann, *Somali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rive for Un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2.

特征。伊斯兰教在索马里沿海地区的传播以阿拉伯移民为主体。但相较而言,南部地区更多以包括商人在内的大批阿拉伯移民为媒介,而北部地区则以传说中的少数阿拉伯圣徒为主。阿拉伯移民的规模很小,在时间上也要晚于南部沿海地区。此外,尽管北部地区与阿拉伯帝国毗邻,但伊斯兰教的传播反而更加缓慢。沿海城市泽拉和柏培拉是北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公元 7~9 世纪,阿拉伯人对索马里缺乏深入的认识,认为泽拉是阿比西尼亚的港口,^①属于黑人的土地,信仰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泽拉的穆斯林甚至被视为“迪米人”,需要向城市统治者缴纳宗教税。13 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哈纳维发现,这两个城市没有多少阿拉伯人,主要居民是黑人,很少有穆斯林。^②索马里北部地区早期的伊斯兰化与传说中的三位阿拉伯圣徒有关。

第一位是阿卜杜拉赫曼·贾巴迪(Sheikh Abdurahman Ibn Ismail Jabarti)。他于 697 年到达索马里东北部,^③并娶当地迪尔部落的首领之女当比拉(Donbira)为妻^④。在索马里的传说中,贾巴迪最先在索马里游牧民众中传教,并且取得了成功。如今,索马里北部的达鲁德部落联盟(Darod)将贾巴迪视为先祖。

第二位是谢赫·伊萨克·伊本·艾哈迈德(Sheikh Ishaq Ibn Ahmed)。他于 1104 年离开巴格达到达泽拉和阿比西尼亚的哈勒尔(Harar)传教,最终定居于亚丁湾附近的梅伊特(Meit),同样也与本地的索马里人通婚。索马里的伊萨克部落将他视为先祖。^⑤

第三位是优素福·伊赫万(Yusuf al-Ikhwān)^⑥,这位阿拉伯圣徒在索马里影响最大,其事迹在索马里广为流传。一些索马里人认为,伊赫万是索马里北部的阿达尔王国(Adal)创立者的第五或第六世先祖,也有人认为他是阿什拉夫即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这些说法如今仍然无从证实,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索马里人试图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中寻求历史的合法性。伊赫万于 12 世纪中期到达索马里,曾与圣徒艾哈迈德会面。伊赫万引入阿拉伯元音来读索马里语

① 泽拉和柏培拉是阿比西尼亚商品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阿克苏姆王国以来,阿比西尼亚人在索马里泽拉和柏培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阿拉伯人将这两个城市视为阿比西尼亚的城市。

② Ali Jimale Ahmed, ed., *The Invention of Somalia*, p. 7.

③ 也有人认为贾巴迪于公元 13~15 世纪之间到达索马里。参见 Mohamed Haji Mukhtar,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pp. 70-71.

④ Mohamad A. Eno, *The Bantu-Jareer Somalis*, London: Adonis & Abbey Publishers, 2008, p. 21.

⑤ Rima Berns McGown, *Muslims in the Diaspora: The Somali Communities of London and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 28.

⑥ 也被称为“Sharif Yusuf Aw Barkhadle”,意为“被祝福的人”。

的元音,使索马里人阅读和誊写《古兰经》更加便捷、容易。^① 这使伊赫万在索马里名声大噪。在索马里口述传统中,伊赫万被视为真主之道的传播者与捍卫者,他与不义的国王作斗争的故事在索马里广为传播。一些索马里人甚至认为伊赫万是索马里伊斯兰化的核心人物。伊赫万的圣墓位于哈尔格萨附近,如今仍有大量索马里穆斯林将之视为圣墓。

这三位阿拉伯圣徒主要在索马里北部沿岸地区传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边的游牧民,并未真正深入内陆地区。索马里关于他们的传说和事迹不乏杜撰的成分,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但这同样反映了索马里伊斯兰化过程中的独特性。他们的传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索马里后来的民族认同观念。在索马里北部,达鲁德和伊萨克等游牧部落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就已存在,它们并非完全源于这些阿拉伯移民。这些部落的阿拉伯认同具有人为的建构性。

据此推断,伊斯兰教在北部地区传播的历史图景可能是:在这些早期阿拉伯穆斯林的影响下,索马里北部的游牧民逐渐放弃了前伊斯兰时代的部落谱系和认同,将这些具有神圣宗教光环的阿拉伯圣徒纳入部落体系和传说当中,将谱系的血统与宗教的道统合二为一,进而重新“发明”了民族与宗教认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游牧部落进行了整合,打破了狭隘的部落和家族的血缘界限,进而将之纳入更大范围的伊斯兰世界。

10 世纪之后,随着索马里北部游牧部落的扩张,以及向南部和内陆地区的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也走向深入。但是,北部的伊斯兰化进程十分缓慢。13 世纪前期的阿拉伯旅行家哈马维(al-Hamawi)就指出,柏培拉的居民肤色很深,讲的是没有文字的语言,摩加迪沙则截然相反。^②

不难发现,索马里南部和北部沿海早期的伊斯兰化都始于阿拉伯移民,具有“阿拉伯化”痕迹,不过都仅限于沿岸地区,并未深入内陆。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随着伊斯兰教在北部地区的传播,一些索马里游牧民被整合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当中,进而改变了他们的谱系结构,重新塑造了对于部落历史的认知。这对于近现代索马里的民族构建和对外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南部沿海地区的阿拉伯化对于索马里本土社会与认同的影响较小。相较于南部海岸而言,伊斯兰教在北部地区的传播更加缓慢和艰难,也更难以吸引阿拉伯移民。这一现象由多种因素铸就。

首先,早期的阿拉伯移民大多是政治或宗教上的异见者,他们往往为了躲避

^① I. M. Lewis, *Saints and Somalis: Popular Islam in a Clan-based Society*, Lawrenceville: The Red Sea Press, 1998, pp. 89–97.

^② Mohamed Haji Mukhtar,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p. XXVI.

阿拉伯帝国的迫害而移民索马里。索马里北部沿岸与阿拉伯半岛毗邻,对于这些阿拉伯异见者或反对派而言并不安全。而南部海岸则距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较远,统治者鞭长莫及。阿拉伯帝国共向索马里四次派出远征军。第一次发生在 7 世纪末,哈里发阿卜杜·马利克(Abd al-Malik ibn Marwan) 派兵征服摩加迪沙和基卢瓦(Kilwa),从而将索马里南部海岸从形式上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统治。^① 摩加迪沙向哈里发效忠,并且缴纳赋税,传播伊斯兰教。755 年,哈里发曼苏尔曾向摩加迪沙派遣总督,以便征税和传播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另外两次远征主要是为了打击印度洋的海盗。^② 但是,阿拉伯帝国并未对南部地区实现直接控制。事实上,索马里南部的地方政权多次反对哈里发的统治,后者对之无可奈何。

其次,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的宗教,与城市文化相契合。当时的索马里南部沿海地区已出现了诸多城市国家,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北部地区的城市较少,而且受到阿拉伯帝国和阿比西尼亚的影响,缺乏独立性,特别是北部地区盛行的游牧文化以及部落习惯法与伊斯兰教存在严重的矛盾。

最后,索马里南部地区自然环境较好,谢贝利河与朱巴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北部地区干旱少雨、炎热难耐、饥荒频发,除牛羊和骆驼等畜牧产品外没有其他物产。柏培拉和泽拉等北部港口也多风暴。^③ 因此,对于阿拉伯移民而言,南部环境更加优越。

索马里北部沿海地区的伊斯兰化也对现当代索马里民族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部的部落将谱系追溯到早期的阿拉伯圣徒,甚至是哈希姆家族。因此,北部的索马里人认为自身在索马里部落的谱系中占据优越地位,支持索马里人的阿拉伯起源说,强调索马里民族起源于北部地区的阿拉伯圣徒。^④ 这种历史观念为 19 世纪的一些索马里史学家重新发现并加以改造,成为现当代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重要历史依据。

三、索马里内陆地区伊斯兰化的本土动力

阿拉伯移民将伊斯兰教传入了索马里,伴随着阿拉伯商人和宗教人士的到来,索马里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伊斯兰教也仅限于沿海

① Mario I. Aguilar, "The Constitution of Somaliland: The Problem of Constitutional Generations and Clan Dissolution," *Sociology Mind*, No. 5, No. 4, 2015, p. 247.

② Abdullahi, Abdurahman, *Recovering the Somali State: The Role of Islam, Islamis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London: Adonis & Abbey Publishers, 2017, p. xi.

③ Ali Jimale Ahmed, ed., *The Invention of Somalia*, pp. 8-9.

④ Mohamad A. Eno, *The Bantu-Jareer Somalis*, p. 16.

城市。^① 14 世纪,随着索马里本土宗教阶层逐渐成长,沿海地区才基本完成伊斯兰化。阿拉伯著名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于 1331 年游历了泽拉和摩加迪沙。他发现这两个城市几乎都是穆斯林,盛行伊斯兰文化。伊本·白图泰当时已将从泽拉到摩加迪沙的广阔地域视为一个国家。^② 当地的索马里人或是远渡重洋赴西亚和埃及,或是从索马里的阿拉伯人那里学习伊斯兰教义和教法。他们最终将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的内陆地区,完成了索马里的伊斯兰化。

14 世纪之后,阿拉伯移民浪潮仍在持续。在索马里的口述传统中,15 世纪有 44 位阿拉伯谢赫在索马里北部的港口城市柏培拉登陆,并向内陆进发,传播伊斯兰教。^③ 柏培拉附近有座山名为“圣人之山”(Mount of Saints),据说这些谢赫曾在这里聚会。尽管索马里人如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但这些圣徒大都湮没在历史之中,他们的英雄业绩更多的是索马里人口耳相传的英雄故事。在索马里的内陆地区,游牧文化盛行,生存环境恶劣。事实上,即便有少数阿拉伯移民在历史上进入内陆地区,也很难将索马里内陆的伊斯兰化归结为这些人。总体来看,内陆地区的伊斯兰化是由索马里人完成的,而非阿拉伯人。

14 世纪,索马里本土宗教人士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传教的主力。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后,不断有索马里人赴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地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特别是,索马里与也门隔海相望,海上交通十分便捷和发达。大量的索马里人渡海赴也门求学,其中许多索马里人在当地获得了很高的名望。也门历史学家哈兹拉吉就指出,13~14 世纪,至少有 14 名来自泽拉的索马里人在也门成为著名的宗教学者,并且葬在也门。^④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伊斯梅尔·贾巴迪(Sheikh Ismail al-Jabarti, 1322~1403)。^⑤ 他是当时也门最知名的宗教学者之一,统治着当时也门的宗教中心扎比德城(Zabid),每年有数万人到此地学习,就连也门素丹都对他颇为忌惮。扎比德也由此成为索马里宗教人士聚集之地。^⑥

除了这些索马里裔知名宗教人士外,还有大量索马里人在西亚北非尤其是也门学成后回到索马里传教,这使索马里本土的宗教力量发展起来。13 世纪,摩加迪沙建立了大量宏伟的清真寺。15 世纪左右,摩加迪沙成为东非地区伊斯兰

① [摩洛哥]M. 埃尔·法西主编《非洲通史(第三卷)》,第 550-551 页。

② 这里并非指统一的国家。伊本·白图泰可能发现了这一地区的共同性的特点或者是民族认同。参见[摩洛哥]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5-147 页。

③ Ali Abdilahir Hersi, *The Arab Factor of Somalia History*, p. 130.

④ Ibid., p. 132.

⑤ 也有人认为伊斯梅尔·贾巴迪是达鲁德部落联盟的先祖阿卜杜拉赫曼·贾巴迪的父亲。

⑥ Abdurahman Abdullahi, *Recovering the Somali State: The Role of Islam, Islamis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p. 132.

教传播的中心,被誉为“伊斯兰之城”。很多学成归来的索马里人,以及在本土接受教育的宗教人士,将传教的目标转向内陆地区。一些沿海地区的游牧民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也向索马里南部和内陆地区迁徙、征服,最终使伊斯兰教在内陆地区立足。特别是在 14 世纪阿朱兰部落(Ajuran)皈依伊斯兰教后,游牧民从南部沿海地区向内陆迁徙,直接推动了谢贝利河中下游地区的伊斯兰化。^①他们初期以和平传教和移民为主,而后则开始通过军事征服的手段传教,征服了之前由非穆斯林占据的欧加登地区^②,甚至将伊斯兰教传入阿比西尼亚。该部落于 15 世纪建立了阿朱兰素丹国,统治索马里的南部地区。^③

索马里内陆游牧民的伊斯兰化也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往。伊斯兰教传入非洲之角后,与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会、本土的多神信仰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总体上这种竞争是以和平形式呈现。11 世纪之后,索马里南部和北部沿岸地区诞生了一系列素丹国。14 世纪后,索马里的一些素丹国试图摆脱阿比西尼亚的影响,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与阿比西尼亚竞争地区的权力。这种对抗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④索马里的这些政权为了强化自身力量,维持国内稳定,招募更多的游牧民加入军队,积极传播伊斯兰教,甚至为此要求索马里内陆的游牧民强制皈依伊斯兰教。宗教对抗的话语也吸引着境外大量穆斯林到达索马里,参加针对阿比西尼亚人的“圣战”。这些游牧民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不仅开始服从国家政权,而且也显示出强大的宗教热忱。

应该说,从 7 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直到 16 世纪索马里才基本完成伊斯兰化,时间长达 7 个世纪。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的传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阿拉伯移民到达索马里海岸尤其是南部地区,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火种带到了索马里,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索马里人。在第二阶段,随着沿海地区城市文明的发展,以及当地人的伊斯兰化,特别是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播,11~16 世纪索马里形成了一系列城市国家,^⑤大批索马里人受到伊斯兰教的浸染和影响。但是,16 世纪之后伊斯兰文明对索马里一些边远的内陆地区仍然鞭长莫及。这些本土化的力量最终推动了索马里内陆地区和游牧民的伊斯兰化。

① Ali Abdilahim Hersi, *The Arab Factor of Somalia History*, p. 134.

② 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交界处。

③ Raphael Chijioko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pp. 40-43.

④ 参见 I. M. Lewis, *A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a: Nation and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 Boulder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65, pp. 25-32.

⑤ 主要有北方的伊法特素丹国(Ifat)、阿达勒素丹国(Adal),南方的阿居兰素丹国(Ajuran)。详情参见 Mohamed Haji Mukhtar,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pp. 35, 44-45.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索马里的传播伴随着两种文明的互动与交往。同时,相较于西亚和北非其他国家,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的传播具有显著的特点,即以和平的方式,通过阿拉伯移民与索马里本土民族的交往逐渐实现。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具有一定程度的阿拉伯化特征。当然,在不同地区阿拉伯化的程度也不同。在埃及、马格里布、新月地带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但在中亚、南亚、小亚细亚和伊朗更多的是文化上一定程度的阿拉伯—伊斯兰化。索马里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交往主要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阿拉伯人并未征服索马里,宗教上更多的是缓慢的传播过程。在某些情况下,索马里人存在与阿拉伯移民的血缘联系,产生了“索马里化”的阿拉伯人,或者“阿拉伯化”的索马里人。但是,更普遍的图景是宗教文化的传播塑造了索马里的阿拉伯认同。

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向索马里内陆地区的渗透是由本土力量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地区的某些部落并不认同于阿拉伯起源。与之前阿拉伯移民不同,索马里人在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过程中具有深厚的本土化印记。在这一波伊斯兰化进程中,这些索马里人认同的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他们并不完全强调索马里人的阿拉伯起源,以及本土部落谱系与阿拉伯移民的关系。这就造成了内陆一些索马里部落民尽管皈依伊斯兰教,却与沿海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历史记忆存在鲜明的差异。他们并不完全认同部落社会的阿拉伯起源。这一现象在索马里南部内陆地区更为显著。

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复杂性还在于,在本土力量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向内陆地区传播的同时,还涉及本土信仰与伊斯兰教的深度融合。而在这一过程中,苏非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某些苏非派本身拥有阿拉伯的圣裔起源,它们在于内陆地区部落交往中,也存在重新塑造阿拉伯认同的取向。

四、苏非派、部落社会与阿拉伯认同的分际

如果说伊斯兰教在索马里传播的前两个阶段分别以阿拉伯化和本土化为特征,那么,第三个阶段则主要体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索马里本土宗教和文化的深度融合,即苏非主义在索马里的传播与发展。这一过程更加漫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苏非主义在索马里十分盛行,对索马里的宗教与文化实践具有深刻影响。^①由于索马里社会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的部落组织和苏非教团对于阿拉伯起源的历史记忆认知并不一致,这就造成了索马里社会的历史记忆更加碎片化和复杂化。

^① Markus V. Hoehne, Virginia Luling, eds., *Peace and Milk, Drought and War: Somali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I. M. Lewis*, p. 120.

卡迪尔教团 (Qadiriyya)、艾哈迈迪耶教团 (Ahmadiyya)、萨里希教团 (Salihiyya) 和里法伊教团 (Rifa'iyya) 在索马里影响最大。^① 其中,里法伊教团主要流行于索马里的阿拉伯人之中,传播范围相对有限,前三者成为索马里苏非派的主要代表。

15 世纪,卡迪尔教团由阿布·巴克尔 (Sharif Abu Bakr)^② 传入阿比西尼亚东部城市哈勒尔,^③ 并成为当地的正统教团,此后逐渐传入邻近的吉布提和索马里地区。艾哈迈迪耶教团和萨里希教团传入索马里要晚得多。艾哈迈迪耶教团创立于 18 世纪,此后由谢赫·阿里·梅伊·杜罗巴 (Sheik Ali Maye Durogba) 传入索马里。^④ 萨里希教团最初是艾哈迈迪耶教团的分支,19 世纪末由穆罕默德·古利德 (Sheik Muhammad Guled) 传入索马里。^⑤ 艾哈迈迪耶教团和萨里希教团主要分布于索马里南部的农耕地区,特别是谢贝利河与朱巴河流域,前者更关注于传教,追随者在三大教团中最少;而后者思想较为激进,被正统的卡迪尔教团蔑称为“疯毛拉”^⑥,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20 世纪,萨里希教团鼓励索马里人摒弃狭隘的部落认同,追求民族统一,并且成为反对英国、意大利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卡迪尔教团主要分布于索马里北部和中部的游牧部落地区,在南部农耕地区影响有限。值得注意的是,索马里的苏非派除了上述相对统一的教团组织之外,还有大量以圣徒尤其是早期阿拉伯传教者为中心的宗教组织。它们往往以血缘关系维系道统的传承,崇拜共同的祖师即早期的阿拉伯传教者,圣墓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这些宗教组织相对独立,不属于特定的教团,在索马里更加普遍。

索马里是一个典型的部落社会,而伊斯兰教在某种意义上是城市的宗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相比之下,苏非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部落社会与伊斯兰教的相互协调和融合,最终使伊斯兰文明本土化。这种融合首先体现在教团组织 (Jama'a)^⑦ 与部落组织的关系上。从形式上看,教团组织以道统作为传承方式,具有自身的谱系结构,这与部落的血缘谱系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

① 关于索马里的卡迪尔教团和萨里希教团的介绍,参见 Said S. Samatar, ed., *In the Shadow of Conquest: Islam in Colonial Northeast Africa*, Trenton: The Red Sea Press, 1992, p. 11.

② 又名库特布·拉巴尼 (al-Qutb Rabbani), 大约卒于 1508 年~1509 年,他是当时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知名的宗教人士。

③ I. M. Lewis, *Saints and Somalis: Popular Islam in a Clan-based Society*, p. 11.

④ Irving Kaplan, Margarita K. Dobert, James L. McLaughlin, Barbara Marvin, H. Mark Roth, Donald P. Whitaker, *Area Handbook for Somalia*,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 165.

⑤ Abdullahi, Abdurahman, *Recovering the Somali State: The Role of Islam, Islamism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p. 133.

⑥ Mohamed Haji Mukhtar, e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omalia*, p. 196.

⑦ Said S. Samatar, ed., *In the Shadow of Conquest: Islam in Colonial Northeast Africa*, p. 11.

但是,作为一种外部的社会力量,教团组织的兴起必然扰动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然而,两者的关系在索马里南北方存在一定差异。

相较而言,索马里北部的部落社会与苏非主义相互融合,致使苏非的道统被纳入部落谱系当中。由于许多苏非教团强调阿拉伯起源,甚至是哈希姆起源,部落谱系也因此具有阿拉伯属性。索马里北部以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游牧文化而闻名。苏非教团脱离游牧部落无法生存,因此北方的教团大多依附于特定的游牧部落。^①其中,很多教团加入游牧部落,成为部落的一个分支。例如,加萨尔·古达部落(Gasar Gudda)有七大分支,部落首领在其中的六个分支中轮流担任;第七个分支源于宗教圣徒,属于苏非派。^②在这种状况下,很多游牧部落将自身的谱系与教团的道统进行整合,强调部落的阿拉伯尤其是哈希姆的起源。从北部的伊萨克和达鲁德两大部落的谱系中可以发现大量神圣的宗教头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非教团已经融入部落谱系当中。这些部落也就具有了神圣的起源,以及在部落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教团在部落中处于较低的地位,需要服从部落长老,并向部落效忠。当两者发生矛盾后,教团脱离部落组织,但必须归还部落分授的土地。因此,北部内陆地区的索马里部落也类似于北部沿海地区,将阿拉伯圣徒视为部落社会的先祖。鉴于此,在历史记忆方面,索马里北部内陆地区的部落社会与沿海的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一致,阿拉伯起源成为流行的说法。

然而,南部内陆的部落地区则不同。索马里南部地区自然环境适宜农耕,部落社会多以定居农业为主,许多苏非教团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形成了一些农业定居点。这些教团大致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土地。一是教团的谢赫调解当地不同部落的土地争端,借此获得双方存在争议的土地作为报酬。这种土地相当于两个部落的隔离区和缓冲区。二是从部落租借土地,并向部落提供一定的租金。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部落,当部落与教团发生矛盾后,部落有权收回土地。索马里南部地区存在大量类似的苏非教团定居点,很多都位于部落的交界之处。^③有些教团甚至强大到可以介入部落内的事务。比如,萨拉曼部落(Saraman)将阿什拉夫教团(Asheraf)视为部落的“第三只脚”,教团的谢赫甚至受邀参加部落大会。^④这类教团的土地共有,由谢赫在教团内部分配,实行集体劳动。教团的收入要截留一部分作为公用,以帮助穷人、资助成员朝觐等。当然,教团可以通过宗教活动和仪式获得部落及其他人的馈赠和捐助。索马里南部的宗教定居点相对灵活且具有开放性,许多奴隶和部落民也脱离部落组织加

① I. M. Lewis, "Sufism in Somaliland: A Study in Tribal Islam II," p. 149.

② Akbar S. Ahmed and David M. Hart, eds., *Islam in Tribal Societies: From the Atlas to the Ind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008, p. 141.

③ I. M. Lewis, "Sufism in Somaliland: A Study in Tribal Islam I," p. 599.

④ Ibid., p. 598.

入教团当中。因此,教团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部落社会的影响力,瓦解部落的谱系结构。但是,索马里南北方的这种差异是相对而言的,在南方也存在部落将一些教团纳入其谱系当中的现象。

与北部地区不同,索马里南部内陆地区部落社会与教团基本能上相互独立,在某些情况下双方还有竞争。部落酋长与苏非教团的首领存在权力博弈,在部落民中竞争影响力。尽管有一些教团强调阿拉伯的起源,但由于教团与部落组织的分立,两者各自为政,相当一部分部落组织并不承认自身的阿拉伯起源。

苏非主义在索马里的传播推动了教团与内陆地区部落组织的深入交往,与之相伴的则是伊斯兰教对部落社会的深度渲染,以及伊斯兰文化与本土宗教信仰的融合,进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苏非派除了作为社会力量外,还具有传教的功能。这些宗教人士可能是历史上索马里内陆地区主要的知识阶层。他们走村串巷,在部落之中开设临时宗教课堂,无偿为部落民尤其是儿童传授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古兰经》相关知识、阿拉伯语的读写,以及礼拜和斋戒等伊斯兰教的基本礼俗等。苏非派宗教人士因此也被戏称为“丛林宣教者”。这可能是部落民接受的全部宗教教育,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苏非主义还深植于索马里部落民的社会生活之中。苏非派的谢赫有时充当非官方“卡迪”(宗教法官)的角色,在索马里称为“瓦达德”(Wadaad)^①,负责处理部落内的婚丧嫁娶、财产继承等事务。索马里遍布圣墓,苏非教团往往以圣墓为中心,这些圣墓也成为当地部落民尊崇的对象。一些圣墓的祭拜者甚至达数万人。一些部落甚至也效仿苏非派,将前伊斯兰时代先祖的坟茔也“改造”为圣墓,进行祭拜。^②但从本质而言,苏非主义与部落文化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苏非教团主张在社会中推行伊斯兰法,而部落社会却以部落习惯法为主。两种法律体系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伊斯兰教法只能处理苏非教团内部的事务,而无法干预部落事务。部落也一直抵制伊斯兰教法的影响。当然,有些部落认为它们的习惯法就是伊斯兰教法。在很多情况下,苏非派的谢赫能够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与部落社会维持和谐状态。但是,如果两者爆发冲突一般以教团的失败而告终,特别是那些加入部落组织的教团尤其是如此。

苏非派在部落社会的上述宗教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索马里部落社会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苏非派也吸纳了大量的索马里本土信仰,使苏非主义具有了“索马里化”的特点。在伊斯兰教中,安拉是绝对的存在。索马里人将安拉视为传统的神祇天神扎尔,将两者等同。南部和北部的索马里人分别用艾比

^① 该词有毛拉之意,指宗教法官、宗教学者等多重身份。Mohamed Diriye Abdullahi, *Culture and Customs of Somalia*,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p. 143.

^② I. M. Lewis, "Sufism in Somaliland: A Study in Tribal Islam I," p. 596.

(Eebbe) 和瓦克(Waaq) 来指称安拉。^① 尽管伊斯兰教与索马里传统宗教都具有神创世的说法。但两者在死亡观念上有所不同。索马里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 仍然认为逝者的灵魂寄居于坟墓之中, 这是索马里人圣墓崇拜的重要渊源。索马里的圣墓崇拜在某种意义上是前伊斯兰时代祖先崇拜的变种。

此外, 索马里的传统宗教将彩虹视为天神的眼带。皈依伊斯兰教后认为彩虹是善者通往乐园的桥梁。南部地区的索马里人认为其圣徒赫勒提(Au Hiltir) 保护人们免受鳄鱼的袭击,^② 圣徒纳德(Au Nad) 被汉拉文部落联盟视为庄稼的保护者。索马里的传统宗教舞蹈萨尔舞(Saar)^③ 后来也为一些苏非派接受, 用来感知真主。

随着苏非主义的传播, 教团与部落社会发生了深度融合, 推动了伊斯兰教在索马里部落社会的传播。这一过程中, 伊斯兰教也与索马里的传统宗教信仰相互影响。苏非主义最终将两种信仰体系糅合, 完成了索马里的伊斯兰化。索马里人更多是通过传统信仰和部落文化的双重透镜理解伊斯兰教。尽管一些苏非教团将其起源追溯到阿拉伯移民甚至是圣裔家族, 但由于索马里社会的多样性, 苏非派与部落社会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因此, 伴随着苏非主义的传播以及伊斯兰化的完成, 索马里在内陆部落地区整体上呈现二元化的倾向, 北部部落社会一定程度上拥有阿拉伯认同, 而南部的阿拉伯认同则相对较弱。

五、索马里阿拉伯认同的起源及其当代回响

索马里的伊斯兰化进程伴随着阿拉伯人的移民浪潮, 使伊斯兰化与阿拉伯化具有了紧密的关联。但这却是一幅复杂的历史图景, 在不同的地区具体表现有所差异。南部沿海城市有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移民, 尽管他们将伊斯兰教传入这一地区, 但更关注在红海与印度洋间的经商活动和反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 向周边地区传教似乎并不是他们的旨趣。而北部沿海地区尽管阿拉伯移民稀少, 但却主要抱有宗教目标, 并在北部地区进行传教, 与当地的社会逐渐融合, 并成为后来阿拉伯起源说的重要依据。事实上, 阿拉伯人到达沿海地区传播宗教只是伊斯兰化的第一个阶段, 广袤的内陆地区和部落社会仍然未被阿拉伯—伊

① 两者皆是前伊斯兰时代索马里本土宗教的神祇, 即前文中所述的扎尔。艾比常用于北部地区, 瓦克常用于南部地区。参见 I. M. Lewis, *Saints and Somalis: Popular Islam in a Clan-based Society*, p. 136.

② 一般认为, 对于赫勒提的崇拜起源于前伊斯兰时代。详情参见 I. M. Lewis, *Peoples of the Horn of Africa: Somali, Afar and Saho*, London: Haan Associates, 1955, p. 147.

③ 传统宗教仪式中, 在进行萨尔舞表演时, 舞者甚至进入癫狂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这种舞蹈也存在于当代埃及以及其他一些中东国家。Akbar S. Ahmed and David M. Hart, eds., *Islam in Tribal Societies: From the Atlas to the Indus*, p. 150.

斯兰文明所浸染。完成这一进程的恰恰是索马里本土化的宗教阶层和苏非主义的传播。当然,这仅是索马里伊斯兰化的梗概,在现实中要比这复杂得多。索马里经历了千余年基本上完成了伊斯兰化。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在索马里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遗产。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索马里的文明形态,客观上打破了部落认同的狭隘观念,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秩序,更重要的是塑造了索马里人的民族认同观念,使松散和分裂的索马里社会逐渐具有了共同的意识。在诸多的遗产中,对于阿拉伯起源的记忆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客观而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索马里本土文化的交往幻化出诸多的认同观念,如对于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的认同、苏非派的认同,以及具体的教派认同、部落认同等。阿拉伯认同只是其中的一种。在古代的索马里社会,基于特定族群(ethnic group)的认同观念可能并不强烈。但是,阿拉伯认同被索马里近代的民族主义唤醒,并“被嵌入一个对于现实的更普遍的解释”^①,进而成为近代以来索马里社会的重要认同来源。这也是索马里于 1974 年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历史与文化渊源。

这种认同的内在逻辑是:索马里人源于早期迁往北部地区的阿拉伯圣徒,^②这些圣徒来自哈希姆家族,与当地入通婚之后,繁衍出索马里族。历史上,随着索马里人由北向南迁徙,扩展到整个非洲之角。按此逻辑,一些索马里人认为,索马里族源于亚洲,具体而言就是阿拉伯半岛,并不是非洲本土的民族,索马里族因此是同质性的民族。这在某种意义上受到近代西方观念的影响,否认本民族的非洲起源。

阿拉伯认同在现当代索马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索马里人将索马里部落谱系进行重新建构,所有索马里人被视为萨马勒(Samaale)^③和萨卜(Sab)两兄弟的后裔,两者分别为北部和南部部落的始祖,起源于哈希姆家族。^④20 世纪 60 年代,索马里独立后,一些知识精英希望以阿拉伯语作为索马里的国语。^⑤一些研究者也强调阿拉伯起源说,甚至索马里的教科书也一度承认索马里人源于阿

① [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16 页。

② Mohamad A. Eno, *The Bantu-Jareer Somalis*, p. 25.

③ 一些索马里人认为,索马里的国名来自于萨马勒。事实上,“Somalia”最早出现于 15 世纪早期阿比西尼亚的赞美诗中。参见 Lee V. Cassanelli, *The Shaping of Somali Society: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a Pastoral People, 1600–19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p. 1516.

④ 具体的谱系结构参见 Saadia Touval, Saadia Weltmann, *Somali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rive for Un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p. 17.

⑤ 长期以来,索马里没有本土的书写语言。1972 年,索马里政府以拉丁字母拼写索马里中部方言,创造了索马里的文字体系。Saadia Touval, Saadia Weltmann, *Somali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rive for Un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p. 98.

拉伯人。^①

通过上述对于阿拉伯移民和伊斯兰教传统的分析可以推断出,阿拉伯起源说本身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索马里部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部落组织并非都认同于阿拉伯起源。如前所述,索马里南部伊斯兰化的进程中,部落组织并未与苏非教团大规模融合。这些部落组织具有区别于阿拉伯起源的谱系结构,无法将之纳入阿拉伯起源说中。非圣裔出身的部落遭到边缘化和污名化,沦为二等公民。而班图人的地位更为低下,索马里形成了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②。

第二,阿拉伯起源说具有现实政治的隐喻,背后隐含着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权力诉求。历史上,索马里并未形成统一的国家,近代又被英国和意大利分别殖民统治。索马里独立后,南北之间本身存在权力博弈。阿拉伯起源说强调北方才是索马里人的祖居之地,是早期阿拉伯圣徒的传教之地,因此北方的部落尤其是达鲁德部落和伊萨克部落的历史和宗教地位更为显赫,这迎合了北方的权力诉求。

第三,阿拉伯起源说在客观性上存在瑕疵。索马里历史上的阿拉伯移民规模并不大。西方学界一般认为,索马里本土居民最早起源于阿比西尼亚东南部地区。^③与其他北非阿拉伯国家相比,索马里历史上的阿拉伯移民有限,尽管与本土居民存在通婚现象,但索马里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乃至体质特征上,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阿拉伯人。

正因如此,索马里独立后,一些本土知识分子提出非洲起源说,以反对阿拉伯起源说。前者强调索马里人源于非洲本土。一些修正派历史学家强调索马里社会的多元性而非同质性,反对阿拉伯和亚洲起源,也反对将族源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依据。索马里学者伊诺(Omar Eno)就指出,索马里属于多元的民族,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语言、价值和命运。^④他们宣扬索马里民族主义而非阿拉伯民族主义。两种历史认同的冲突成为影响现当代索马里国家建构的重要因素,如今仍然有其回响。^⑤

(责任编辑:章远 责任校对:李意)

① Mohamad A. Eno, *The Bantu-Jareer Somalis*, p. 31.

② Susan M. Hassig, Zawiah Abdul Latif, *Somalia*, New York: Marshall Cavendish, 2008, p. 57.

③ David D. Laitin, Said S. Samatar, *Somalia: Nation in Search of a Sta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pp. 4-10.

④ 转引自 Mohamad A. Eno, *The Bantu-Jareer Somalis*, pp. 24-25.

⑤ 在2012年的宪法草案中,规定索马里是非洲和阿拉伯民族(nation)的成员,阿拉伯语是第二官方语言,宪法也未对索马里人的民族属性进行明确界定。参见“The 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net*, August 1, 2012, http://constitutionnet.org/sites/default/files/adopted_constitution_eng_final_for_printing_19sept12_-_1.pdf, 登录时间:2020年9月20日。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07 On Islamization of Somalia 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Arabic Identity

Abstract The spread of Islam in Somalia is accompanied by the process of “Arabization”, which has shap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Somalia to a certain extent. Islam was introduced to Somalia by Arab immigrants at the end of the 7th century AD. Mogadishu, an Arabized city state, was formed, and Islam spread to the interior of Somalia. Zella and Berbera which located on the coast of the Gulf of Aden, are the center of Islam spread in the north. In contrast, Islam spreads slowly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it mainly relies on the mission of Arab saints in some legends. In the 14th century AD, the coastal cities of Somalia basically completed Islamization, and a large number of Somali native ulemas grew up, and spread the Islam to the inland tribesmen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Sufism, which promote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ufism and tribal society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More importantly, some Somalis began to reconstruct their own lineage and traced it back to the early Arab immigrants, the ancestors of Sufism, that is, Hashemite. This has become the origin of Somali Arab identity since modern times,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omalia.

Key Words Islam; Somalia; Arabic Identity; Sufism; Tribe

Author YAN Wei, Ph. 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124 Egypt's Employment Plight in the Mubarak Era and its Causes: On the Resolution of Employment Problems in Current Egypt

Abstract In the Mubarak Era,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employment in Egypt: unbalance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women and young people have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jobs;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unpaid workers are prominent. The employment predicament in Egypt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ree core factors: population expansion, irrat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imbalance. The Sisi government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Mubarak authorities and improved employability through various means, including vigorously attracting investment,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and manufacturing, continuing to develop the private economy, supporting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lthough these measures have achieved some results, they have not yet fundamentally solved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employment problems. The solution to the employment dilemma in Egypt still requires long-term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Key Words Egypt, Mubarak regime, Employment, Sisi government

Author CHEN Tianshe, Ph.D., Professor, History of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HU Ruizhi, Master Candidate, History of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140 The Ethnic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Dilemma of the Armenians in Egypt

Abstract The Armenians in Egypt have a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and a long history of existence. In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historical changes, the Egyptian Armenians have maintained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ir ethnic groups by abide by the tradition of autonomy, emphasizing ethnicity, establishing a self-help system, and reshaping historical memory. They have long retained their original customs, language,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at distinguish them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Contemporary Egyptian Armenians are alway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dilemmas such as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main nation, the dilemma of identity, population decline, inter-ethnic marriag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threats, and these factors have an import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uture existence of the entire ethnic group.

Key Words Egypt; Armenians;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y; Dilemma

Author ZHAO Ju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